

试论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

吴心伯

[内容提要] 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中美两国在保持台海地区的稳定、一个中国、两岸交流与对话、中国大陆与台湾的和平统一等问题上达成了有限却十分重要的共识。这些共识促进了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利于台海地区局势的稳定。

[关键词] 台湾问题 美国对台政策 和平统一

[作者简介] 吴心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邯郸路 220 号,邮编:200433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问题便成为中美之间一个挥之不去的纷争之源,在 50 和 60 年代的中美交恶时期,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纠葛加剧了双方的对抗,中美交往的大门打开后,台湾问题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战略格局、中美关系、大陆对台政策等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中美两国也在台湾问题上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共识,这些共识构成了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利于台海地区的稳定。本文拟对此作一探讨。

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

蒋介石 1949 年败退台湾后,念念不忘反攻大陆。1953 年,艾森豪威尔上台,执行“放蒋出笼”的政策,为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封锁和袭击大陆开了绿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认为蒋介石没有力量反攻大陆,另一方面,在朝鲜战争后,美国也不希望被拖入另一场同中国的战争。此外,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图谋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使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分裂状态永久化、合法化。这些因素使华盛顿不再愿意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第二次台海危机的炮声中访台,在同蒋介石的会谈中,迫使蒋承诺不再对大陆使用武力。在 11 月 23 日发表的“蒋杜联合公报”中,台湾当局宣布在原则上“放弃使用武力收复中国大陆”,同意实现“重返大陆”的主要手段是实行“三民主义,而不是使用武力”。尽管杜勒斯的主要意图是要制造台海两岸“划海而治”,但这个公报客观上捆住了蒋介石的手脚,有效地阻止了蒋介石残余势力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第二次台海危机后,国民党军队武装袭击大陆沿海地区和岛屿的军事行动完全停止,它从 1949 年败退台湾后便开始的对大陆闽粤沿海港口的军事封锁亦全部开放。这无疑大大改善了大陆东南沿海的安全环境。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 2 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版,第 2915、2886 页。

1962年夏,蒋介石利用大陆经济困难之际,图谋反攻大陆,台海形势再度紧张。中国领导人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还存在着一些困难,关键就是看美国的态度如何,因此,周恩来总理命令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方代表王炳南设法争取让美国采取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6月23日王炳南向美方代表卡伯特谈了日趋严峻的台海局势。他指出,美国政府完全清楚台湾当局准备窜犯大陆的情况,蒋介石一旦挑起战端,其结果绝对不会给美国带来任何好处,美国政府必须对蒋介石的冒险行动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负完全责任。卡伯特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决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美国不要一场世界大战。卡伯特还表示,如果蒋介石要行动,中美两家应联合起来制止他。6月27日肯尼迪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谈到台海局势时表示:“美国反对在这一地区使用武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目的是为了和平,是防御性的”。他还重申,杜勒斯和叶公超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签字后的换文被视为是条约本身的一部分,换文至今仍有约束力,在未获得美国同意之前,台湾当局不能采取反攻大陆的行动。曾担任台湾“行政院长”的郝伯村在回忆此事时称:“1962年,我们确实准备反攻大陆,最后受制于美国不点头。”60年代初,中国内有“大跃进”造成的严重经济困难,外有中苏反目、中印边界之争,国家安全形势十分严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无疑大大减轻了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压力。

60年代中期,随着美国侵越战争的升级,蒋介石再一次蠢蠢欲动,伺机反攻大陆。1965年9月,蒋经国以“国防部长”身份访美,向美国国防部长麦克拉马拉提出“火炬5号”计划,内容是: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海空军掩护和运送下,登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5省,以切断中共援越的腹地和补给线。蒋经国告诉麦克拉马拉,国民党军队选定西南5省为登陆地点,因为中共在上述地区的控制“最弱”,在这个地区的大陆人民对中共的愤恨“最强”,而蒋介石在这5省内的威望“最高”。1965年12月29日,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上将访台,蒋介石在与其会晤时,再次提出“中华民国反攻大陆”才是解决越战的根本之道。美方在台湾方面两次提出反攻大陆的建议后,经过考虑,于1966年1月24日由美驻台“大使馆”代办恒安石正式转告蒋经国:美国不支持台湾反攻西南5省。蒋经国对此感到失望和生气,他批评说:“美国拒绝支持‘火炬5号’计划,既打击中华民国的士气,对美国也无好处。”

“文革”爆发后,蒋介石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来争取美国支持他反攻大陆。1967年3月初,美驻联合国大使阿瑟·戈德堡(Arthur Goldberg)访台,蒋要他转告约翰逊总统:“鉴于莫斯科与北京的严重分歧,越南对北京资源的消耗,以及大陆本身的严重动乱,这是铲除大陆共产党政权,摧毁中共核武器威胁的绝佳机会。若不这样做,越战就难以结束,而且事实上会扩大”。对蒋介石的提议,美方迅速作出反应。3月16日,美国务院指示驻台“大使馆”向蒋转达下述口信:“总统对蒋总统所言,曾予以最认真的考虑,美国在此事上的观点,蒋总统是很清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梅孜主编:《肯尼迪总统就台湾海峡地区形势发表的声明》,《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129页。

《联合报》,1995年8月23日。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ashington, September 22, 1965; Earle G Wheeler,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Taipei, December 29, 1965; Hummel,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aipei, January 25, 1966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4- 1968, Vol XXX, China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DC, 1998 pp. 209- 214, 234- 237, 242- 245

楚的,美国的立场并无改变……美国和中华民国持同一立场,即恢复大陆人民的自由,应主要以政治方法而非武力实现。”事实上,由于美军逐渐陷入越战泥潭,华盛顿不愿也无力支持蒋介石的军事冒险。随着台湾反攻大陆最后一个机会的逝去和两年后尼克松的上台,反攻大陆成了蒋介石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一个中国

50和60年代,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伺机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因此,我对美斗争的主要任务也就是反对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在中美打开两国交往大门的交涉中,经过中方的坚决斗争,美国不得不在“上海公报”中表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是美国首次表示尊重台海两岸关于“一个中国”的立场,标志着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有了重大调整。在中美“建交公报”中,又写入了以下内容:“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acknowledges)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建交公报”解决了谁代表“一个中国”的问题,这使中美关系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到了里根时代,美国的上述立场被称之为“一个中国”的政策。里根总统在1982年4月5日给邓小平的信中表示:“美国坚决遵守美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所商定的立场。只有一个中国。”5月3日,里根又在给胡耀邦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政策将继续以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基础。”在“八·一七”公报中,美国重申“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形成的重要共识,这一共识成为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基础。

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的变化、台独势力的壮大和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冲击着美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的政策。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调整对台政策,1995年6月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表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出现严重倒退。在新的形势下,我对美斗争的当务之急是促使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充实“一个中国”的内涵,以遏制台独势力。1998年夏,克林顿总统在访华期间,公开阐述了美国对台“三不”政策,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加入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三不”政策是对美国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内涵的发展,对台独势力无异于迎头棒喝。1999年夏,当李登辉提出“两国论”,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时,克林顿政府派遣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访台,向台湾当局宣示美国对台政策的4个基本要素,第一点即为“一个中国”原则。克林顿总统也在同江泽民主席的热线通话中,重申了美国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定承诺。在1999年9月15日联大总务委员会讨论是否将所谓“台湾在联合代表权问题”的提案列入联大议程时,美国代表多年来第一次针对该提案发言,重申美国政府一个中国的政策,

“Memorandum from the Representative to the United Nations (Goldberg) to President Johnson,” Washington, March 9, 1967;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hington, March 16, 1967. *Ibid.*, pp. 531- 532, 539- 540

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7页。

中央社华盛顿1999年7月23日电;新华社北京1999年7月18日电。

不支持台湾“重返”联合国。美方这一举动显然针对“两国论”而来。中美两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使“两国论”失去了国际生存空间,这是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一次意义深远的合作。

需要指出的是,中美对“一个中国”的共识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中国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立场出发,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而美国则是从1972年以来对华政策的实践中认识到,“一个中国”政策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它使美国能够同时与海峡两岸进行交往,并从中得益;它有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助于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正如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1996年指出的那样,“一个中国”政策“对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以及对整个地区都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出发点不同,但中美两国在政策实践中找到了共同点,这一共同点有助于台海地区的稳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与此同时,应该看到,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不彻底的,美国在同台湾断交、与中国大陆建交后,美台关系的安排无论是法律上(《与台湾关系法》)还是机构上(“美国在台协会”、“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以及后来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都具有准官方的性质。虽然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美国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报签署前夕,里根政府在台湾的要求下就美台关系作出6点保证,内容包括美国不改变在台湾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不修改《与台湾关系法》,不压台湾同大陆谈判,这些均表明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充分体现了美国对台政策的两面性。

两岸交流与对话

1979年,中国领导人把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列为中国在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要解决台湾问题,必须妥善处理好美国因素,至少要争取美国不起阻碍作用。“八·一七”公报签署后,中美在美对台军售问题上的纷争暂时平息下来,1994年中美领导人的互访进一步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气氛,中美关系进入比较顺利的发展阶段。在此情况下,中国政府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1986年9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尔·华莱士时,要求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美国“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在两岸关系问题上,美国起初采取的是袖手旁观的态度。里根总统在1984年时称:“人民共和国和台湾人民之间的问题是应该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将不做任何事情对它进行干预,我们将不做任何事情对一方或另一方施加压力。”在中方的敦促下,美国的立场开始发生变化。1987年3月5日,舒尔茨国务卿应邀访华,他在上海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尽管我们的政策是一贯的,但形势本身不曾是也不可能是固定不变的。我们支持一个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持续的演变的过程。……就我方而言,我们欢迎有助于缓和台湾海峡

《克里斯托弗就美对华关系发表演讲》,新华社《参考资料》1996年5月20日。

约翰·霍尔德里奇著,杨立义、林均红译:《美中外交关系正常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283—284页。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49页。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241页。

紧张局势的发展,包括间接贸易和日益频繁的民间交流在内。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是寻求促进一个有利于这种发展继续发生的环境。”这是美国官员第一次公开表示支持台海两岸的交流与往来。美国的这一政策调整很快对台湾的大陆政策产生影响。1987年7月,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10月,又宣布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允许两岸间接通邮。与此同时,台湾当局还调整了大陆政策的主管机构,放宽转口贸易政策,放宽赴大陆间接投资的范围。促使台湾调整其大陆政策固然有诸多因素,如大陆所执行的灵活务实的对台政策,台湾岛内民众的压力,台湾经济发展的需要,等等,但美国鼓励两岸交往的立场无疑对台湾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台湾的大陆政策出现松动后,里根总统在1988年年初表示,“美国欢迎去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人员的往来,希望这一趋势继续下去。”虽然美国没有明确和直接地要求台湾开放同大陆的“三通”,但她在两岸交流问题上的立场是积极和建设性的。

90年代前半期,大陆对台政策的重点是推动两岸事务性商谈,以事务性商谈促进两岸交流,实现“三通”。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我国政府认识到,两岸事务性会谈之所以难以取得长足进展,关键在于它涉及政治问题而又没有条件解决,两岸间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只有实现政治谈判,才可以为解决两岸经济性、事务性问题创造更好的条件。1996年6月22日,中台办和国台办发言人就李登辉“5·20讲话”发表谈话提出,“如果台湾当局确有诚意,就必须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就作为第一步先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问题或两岸共同关切的其他政治议题与我们进行商谈。”1998年1月26日,钱其琛为纪念“江八点”发表三周年发表谈话,明确提出:“促进两岸政治谈判是现阶段全面推进两岸关系的关键。”

另一方面,美国在台海危机后对台湾问题进行了反省,认为两岸恢复对话是降低海峡紧张局势的有效办法。97年以后,美一改过去对两岸事务性磋商的观望态度,多次敦促双方恢复会谈。在台湾方面回应消极的情况下,美方多次从各种渠道向台北表达美国的立场。1998年1月,由美国前国防部长佩里率领的美“战略安全访问团”访台,向台北转达大陆希望恢复会谈的信息。8月,大陆海协会表示愿意与台湾海基会进行一切有利于和平统一,有利于发展两岸关系的政治对话。9月15日,美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卜睿哲在亚利桑那大学举办的关于“台湾关系法”的一次讨论会上提出:“我们鼓励北京和台北迅速恢复两岸建设性和实质性的对话。”在美方作出这一表态后,10月份,台湾当局领导人公开表示,两岸可以进行“建设性对话”。台湾“陆委会”负责人士并解释,“建设性对话”事实上可以包括政治议题或者不排除政治议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台湾海基会领导人辜振甫10月中旬的大陆之行才具有一定的实质意义,在海协、海基两会达成的四项共识中有一项新的内容,即两会决定进行对话。在第一次汪辜会谈5年后汪辜再度会晤,美国在幕后发挥了一定的“促谈”作用。12月,卜睿哲在另一次公开演讲中对辜振甫的大陆之行和海协、海基两会达成的四项共识表示赞许,强调台海两岸“建设性和有意义的对话”是解决两岸分歧的最佳办法,欢迎大陆和台湾继

《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280页。

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244页。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就现阶段两岸关系若干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96年6月23日。新华社记者范丽青、人民日报记者陈维伟:《全面贯彻八项主张,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人民日报》,1998年1月27日。

Richard Bush, “U. S Policy Regarding Taiwan” Speech at a conference on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the First 20 year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September 15, 1998

续进行会晤、接触和交流。

应该看到,由于美国国内亲台势力的压力和美国对台政策本身所具有的两面性,美在两岸交流与对话问题上一直守住一条底线,即不敦促台湾同大陆谈判。里根政府在1982年向台湾作出的“6点保证”中包含了这一内容,这一立场也为克林顿政府所继承。卜睿哲在1998年12月的那次讲话中称,美国在两岸对话问题上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美国不支持其中任何一方,或迫使一方作出它不愿作的让步。美国不会压台北同北京谈判。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步骤而言,它必须经历三个阶段:两岸交流——对话——谈判。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两岸对话是为政治谈判作准备,形势的发展已经使政治谈判进入两岸关系的议事日程,美方则认为对话的主要功能是降低台海紧张气氛,澄清两岸之间的误解,并使双方找到共同点。至于对话是否应导致政治谈判,美方避而不提。在这一点上,美方的立场与中方还有一段距离。

和平统一

5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并在60年代初进行了一些探索。由于当时国际环境(中美对抗)和国内环境(文革爆发)的制约,这一主张产生的实际影响不大。70年代末,中美建交和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给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我国实现大陆和台湾统一大业的前景,已经进一步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会适时地调整了对台政策,在不承诺不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前提下,改变了以往“解放”台湾的提法,郑重提出了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阐明了中共和中国政府关于实现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基本立场。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具体阐述了和平统一祖国的9条方针政策。

要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台湾方面的态度是关键,同时,由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卷入,争取美国的理解与支持也很重要。有鉴于此,邓小平在1979年年初访美期间,多次阐述我国和平统一的政策立场。他在与美国国会议员共进午餐时表示:“今后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邓小平又表示:“我们力求用和平方式来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和完成我国的统一。”

中国政府关于实现与台湾和平统一的政策立场以及为推进这一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引起了美国方面的积极反应。美方在“八·一七”公报中表示:“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9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1986年4月29日,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帮办李洁明在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称:“美国发表过官方声明,它的基本和一贯的政策是以和平方式实现统

Richard Bush,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Carbondale, Illinois, December 7, 1998

Richard Bush, "The United States Role in the Taiwan Strait Issue" Carbondale, Illinois, December 7, 1998

冬梅编:《中美关系资料选编》,时事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一,这一政策成为签署1982年8月17日联合公报的那次谈判的中心。”这里,美国政府官员不仅重申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而且表达了对中国统一目标的认同。

促使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朝着积极方向发展的有一系列重要因素。首先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众所周知,推动中美接近的是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需要,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中美加强了战略上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被认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这使两国关系的基础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有鉴于此,美国决定“把中国当作一个友好国家对待。”这样,把台湾作为美国在西太平洋不沉的航空母舰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需要便不再存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表现出理解和同情的姿态。其次是中国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不可否认,美国介入台湾问题,既有现实的战略需要,也有道义上的考虑。随着中美建交和美台断交,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已大大下降,但所谓“不抛弃老朋友”的道义考虑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台政策,其具体表现一是关注台湾安全,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二是要求中国以和平手段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美国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关切,自1979年起,大陆陆续采取了一系列降低两岸军事对峙、缓和台海地区紧张局势的重大措施,如停止对大金门、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的炮击,撤消福建军区等,这使华盛顿相信中国政府和平统一台湾的诚意。1979年12月,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最终将会实现统一,北京正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1986年4月29日,助理国务卿帮办李洁明向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指出:“尽管不时有令人忧虑的言论暗示将来可能有军事行动,尽管北京拒绝正式放弃使用武力解决它称之为是一个内部问题的主张,我们认为北京同意美国的观点,即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将会使这个问题复杂化,而不是有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第三,一些美国观察家相信,中国大陆自1979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将使中国社会发生积极变化,这有助于缩小两岸间的差距,为解决台湾问题铺平道路。1980年9月30日,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罗伯特·伯德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走向一个中国》的文章指出,中国的政治改革使它有可能谋求台湾问题的解决,有可能达成一项允许台湾继续作为中国一个兴旺发达的特殊部分的协议;谈判很可能有助于加强台湾的安全和保持它的生活方式。第四个因素是美国对台海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这一现实的体认。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尽管严重对峙,但在“一个中国”问题上却持相同的立场。如前所述,50—60年代,美国曾设想在台海划海而治,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但这一图谋遭到两岸的坚决抵制而无法实现。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决策者认识到,在台湾和大陆均坚持“一个中国”的情况下,两岸关系的前途必然是走向统一,而不是分裂。

然而,中美在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上的共识是不稳定的。上述相关的前提条件的变化削弱了这一共识的基础。90年代以来,在李登辉主政下,台湾岛内台独势力恶性膨胀,台湾当局的台独倾向也越来越明显,这样美国思考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两岸均坚持“一个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245页。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28页。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297页。

《美台关系重要资料选编》,第245页。

《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311页。

中国”——也遭到挑战。另一方面,在后冷战时代国际战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美国政治精英不再把中国看做一个“友好”国家,而是视中国为美国的“潜在对手”,对中国实行接触与防范并重的两手政策。这样,利用台湾问题从战略上牵制中国的冷战思维又悄然复活。在此情况下,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摇摆。一方面,克林顿政府表示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敦促两岸进行对话,希望看到台湾问题尽早解决,并公开阐述对台“三不”政策,但另一方面,美国对台湾问题不再使用“和平统一”的措辞,而是用模棱两可的“和平解决”,美台关系有了实质性的提升,美国对台军售也在质的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中美两国在经历了20年的交往之后,台湾问题仍是双边关系的火药桶。

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到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再到克林顿提出对台“三不”方针,美国对台政策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也从剑拔弩张的对抗走向有限的共识与合作(当然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美国对台政策之所以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不断朝着于我有利的方向发展,首先是由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决策者——无论来自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逐渐认识到为了台湾而同大陆对抗得不偿失,不愿冒在台湾问题上与中国开战的风险。中国国力的上升和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的扩大,也使华盛顿不得不谨慎处理台湾问题,以谋求中国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关系层面的合作。其次,中国政府在事关民族最高利益的台湾问题上勇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谈判、中美建交谈判、美国对台军售谈判以及处理李登辉访美的交涉中,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较好地结合在一起,迫使美方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重要文件和信函中就台湾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要保证。第三,中国政府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局势,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设想,并随着形势的发展不断充实这一思路,就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积极、务实的方针政策,赢得了美国朝野内外有识之士的同情和支持,客观上有利于美国对台政策向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随着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台湾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统一的日程上显得更加突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推动美国对台政策进一步朝着积极的方向调整,不断扩大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回顾历史会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